目　录

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胡愈之（1）
我回来了——我的抗日主张——让“女厨子”都关心政治——做东北军的工作——重到莫斯科——我与救国会——“爱国入狱”运动——一致抗日实现了

·人物述林·

外交耆宿陆徵祥……凌其翰（26）
我与陆徵祥——陆徵祥的青少年时代——恩师许景澄——杨儒的悲剧——陆徵祥的夫人——调任驻荷兰公使——出席海牙和平会议——关于设立领事馆的谈判——电促清帝逊位——改革旧外交行政的尝试——以超然主义者自居——失败的演说——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日本进占青岛——袁世凯妄图称帝——出席巴黎和会——从巴黎归国以后——弃俗隐修——陆徵祥的著作
我采访蒋介石……徐铸成（50）

·抗战史料·

方振武、吉鸿昌抗日讨蒋的片断……段培德（5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八一三抗战中的反间谍斗争 …… 文　强（65）

九国公约及陶德曼诱和——一个紧急电话——毒蛇出洞——一场虚惊——讨价还价，引蛇上钩——闭门造车，四题一夜而解——第三次会谈，毒蛇昏头迷向——果然有变与讨价还价——成交多变，现款实收——毒蛇新计，支票开来——赫德路刘宅第二次会谈——毒蛇终于溜掉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及林世良案 …… 陈孝直（86）

·台港史料·

台湾见闻 …… 孙金铭（89）

初到基隆——台湾民俗——在台北——蒋介石在阿里山——回到大陆

台湾的回教会 …… 马振宇（102）

·工商经济·

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 张鹏程（105）

盛锡福的发展经过——经营特点——业务管理

中国钟厂与三五牌时钟 …… 蒋本仿（114）

设厂经过——革新工艺，发展外销——

外销受阻，致力内销——惨淡经营，频
遭摧残——解放后获得新生

·文化史料·

清华学风和我 …… 王造时（122）

·CC内幕·

国民党CC系的干社 …… 黄敬斋（131）

干社的组织、人事、社员及其它——干
社暴行见闻

·奸佞劣迹·

投敌附逆的傅筱庵 …… 胡鲍洪（156）

投机发迹史——效忠于北洋军阀——多
方请托撤销通缉令——卷土重来——通
商银行挤兑风潮——通商银行落入官僚
资本手中——上海沦陷——汪精卫上台
丑剧演遍——恶有恶报

·清季掇言·

京西香山健锐营 …… 赵孟超（178）

立营始末——兵营编制——营房形式
——技艺表演——官兵待遇——教育实
施——官兵生活——兵额补充——南北

补充·订正·质疑

《徐树铮之死》的补充 …… 赵星缘（200）

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

胡愈之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努力，上海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本文作者以一腔爱国之情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

他呼吁蒋介石政府“联苏抗日”；先后与鲁迅、邹韬奋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和《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等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生活周刊》被封后请杜重远利用关系接办《新生周刊》；历经“新生事件”，和杜重远在狱中做争取张学良、高崇民的工作；协助办《生活日报》，呼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沈钧儒等人发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受潘汉年之托，帮助邹韬奋、陶行知起草《告我国同胞书》；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为营救“七君子”，发起“爱国入狱”运动。

本文追述全面，从中可以了解上海各界及全国奋起抗战的概况。

我回来了

“九一八”的炮声，把我这个一度沉迷于文学、专心学问的青年，一下子卷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那时我刚从巴黎回到上海不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在法国留学时，也正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的时候。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一度繁荣的法国，此时也是百业凋零，一派萧条，失业大军年年增长，生活费用逐年增高，到了一九三〇年，法郎与白银的兑换比价竟增到四倍！靠自己菲薄的稿费收入，及二弟仲持的一点接济，已无法维持我在巴黎大学的学习，我不得不中途辍学，于一九三〇年年底动身回国。从巴黎回上海，一般走海路较为安全便当，我来的时候便是搭的海轮。但是，这次我决定走陆路，横穿整个欧亚大陆回国。为什么要这样子走呢？因为我在法国三年，曾利用假期到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地进行过实地考察，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潜伏的严重社会危机。我在巴黎大学攻读的是国际法，课堂上讲的是各国的经济危机。我参加世界语会的小组活动，接触的大都是觉悟了的工人群众，有的还是法共党员，他们议论的是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经济恐慌，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我进一步明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相。与此同时，我研读了《资本论》，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次飞跃，对资本主义世界已不存什么幻想，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那么，什么主义可以救中国呢？我渴望看一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那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我与驻法苏联大使馆联系，得到了过境签证，但没有得到在苏联逗留参观的许可。于是我又设法向苏联世界语会求助，从国际工人世界语团体年鉴中，找到几个在莫斯科的世界语会同志的地址，写信告诉他们我到莫斯科的日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一切联系就绪，我踏上了归途。经德国和波兰时，也是通过当地世界语会同志的帮助，作了短暂的停留，进行了参观访问。随后，我到达莫斯科，一下车就看到两位挥舞着我熟悉的绿星旗——世界语会旗——的女同志，她们收到了我从法国写给她们的信，特意跑来接我。由于莫斯科世界语会同志的热情奔走，我获得了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许可。他们不但帮我安排了食宿，还替我安排了紧凑而丰富的参观日程。我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国营农

场、商店和学校。参加了工人和学生的群众集会，广泛接触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天真活泼、团结友爱和诚挚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与资本主义世界一片灰暗凋敝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热气腾腾，欣欣向荣。那时正值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些做了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宏伟的建设事业之中。我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产生的奇迹，看到了年轻苏维埃不同凡响的精神面貌，我感到无比欢欣和振奋，未来的世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我开始暗暗寄希望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七天的访问一晃而过，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莫斯科世界语会的同志和新结识的苏联朋友们，经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满洲里，到了我向往已久的故都北平，游览了几天，才继续南下。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底我回到离别了三年的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知道我回来了，表示欢迎我回去，我又回到商务，继续做编辑工作。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钱智修年纪大了，他把《东方杂志》的一应事务都交给了我。我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介绍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文章，我的兴趣渐渐从爱好文学转到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上来了。就在此时，樊仲云来找我，要我给他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撰稿。樊原先也在《东方杂志》，与我共过事。这时他依靠国民党搞了个新生命书店，出版《社会与教育》杂志，但是销路不好。他想约我投稿，打开销路。我说没有什么好写的，要写就写一写我这次回来沿途的见闻。他说："好得很，你写多少，我登多少。"这样，我就开始写《莫斯科印象记》，每周写一段，在《社会与教育》上连载，受到读者欢迎。连载完毕，又由新生命书店出了单行本，畅销一时。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介绍苏联，《莫斯科印象记》作为游记，开始没有引起当局注意，侥幸得以出版发行。物以稀为贵，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印到第五版，后来终于被查禁了。《莫斯科印象记》出版后，影响很大，尤其

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先是上海青年会来请我作报告，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苏州青年会也来找我介绍苏联的社会情况。我到苏州，问题就来了，警察局长找我谈话，说上面有通知，不准宣传苏联。这样我就不能作报告了，只能说苏州风景好，今天天气也好，我到苏州过星期天来了。但是来听报告的群众不肯离去，他们步行跟着我的马车陪我游山玩水，七嘴八舌地问我关于苏联的情况，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行情况，我就这样坐着马车做了一路报告。从《莫斯科印象记》的畅销，从人们对苏联的关心和向往，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也看到了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

我的抗日主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侵略军偷袭、占领了沈阳，数日之间，河山变色，打破了我对未来的憧憬。我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不首先解决这个矛盾，其他一切都是空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独吞中国，乃至称霸亚洲和世界的狼子野心，可谓"路人皆知"。"九一八"的炮声，就是日军准备亡我中华的信号。然而，蒋介石政府此时正忙于"剿共"，大打内战，"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竟命令张学良不放一枪撤入关内，将大好江山拱手让敌。这一切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也提笔参战，在《社会与教育》杂志发表文章，呼吁共赴国难，全民抗日。我根据国际法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向我不宣而战了！在外交上，我们应该立即与日本绝交，宣战抗日；同时应与支持我们抗日的苏联恢复邦交，联苏抗日。应我的要求，文章一字不改，用"胡愈之"的名字全文发表了。当时还没有这样子宣传抗日的，刊出后影响很大，《社会与教育》也销路大增。

《莫斯科印象记》和我宣传抗日的文章发表引起了党对我的

关注。有一天，沈雁冰打电话约我去他家，说有人找我。我去见到了暌违已久的张闻天，张原是《东方杂志》的一个作者，早就认识，我在莫斯科停留时还曾找过他，但他不在，我只见到了他的兄弟。这次会面，他着重了解我的简历及思想状况，准备吸收我入党，并要我参加苏联之友会的座谈。我在上海青年会参加了两次座谈，我发表意见说："中苏友好，就是要促成中苏两国建立抗日同盟，实现联苏抗日。如果发表该会成立宣言，务必把这点写进去。这种联盟当然是政府之间的，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我认为联苏抗日可以对日形成有效的威慑，也可以促使蒋政权'改弦更张'，放弃'不抵抗'政策……"但是，我的意见几乎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我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他们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中苏的联合，只能是苏联政府与中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联合，而且这种联合是必然的，是已经存在的。当务之急是宣传群众，"武装保卫苏联"，"完成中国革命"，因为日本占领东北的目的是要进攻苏联……当时，党正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控制之下，他们看不到沈阳的炮火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国民党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整个形势已急转直下。他们夸大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仍旧强调国内的阶级斗争……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随后，又因为上海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苏联之友会也就没有成立起来。事后我还受到党办的一些公开小报的攻击，说我是想到国民党外交部去当官……但是，一九三二年冬，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舆论压力下，蒋政府与苏联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主动与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在我艰苦抗战的八年中，一直给予财政、军事上的无私援助，发扬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一切也证明了我当初提出的"联苏抗日"主张，并不是错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全国人民反日，抗日，抵制日货，抗议“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东北义勇军马占山部，在黑龙江打响了抗日的枪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北满嫩江桥战役中，击溃了日军精锐多门师团。义勇军无飒步械，又无严密的组织，却凭着一腔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气，人自为战，吓破了日军的贼胆，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群众纷纷募捐，支援这些在白山黑水间艰苦抗敌的英雄。随之又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驻沪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对日军愈演愈烈的野蛮挑衅忍无可忍，毅然奋起抵抗。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孤军奋战二十余天，打得日军增援不迭，死伤无数。随后，英雄的十九路军又与主动赶来增援的张治中部，协同作战，抵抗陆、海、空并进的日军达三十三天之久！而蒋介石除了在开战之初，发过一个通电，说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尤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以外，并无实际行动。遗憾的是，在一二八前后，我患了严重的伤寒症，在高烧昏迷中被送回老家疗治，未能为这次人民的抗战奔走呼号，也不能对来自“左”倾错误的指责进行申辩。但我还是与邹韬奋、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冯雪峰、丁玲、周扬、夏衍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后来又在四十三人基础上，联合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发表了《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让“女厨子”都关心政治

我被病魔缠扰了近半年，当我病好返回上海时，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已经签订。日军在蹂躏我东北，又在上海大肆烧杀之后，依然被奉为“友邦”！南京、东京依然信使往来，鼎俎交欢！抗日被指责为“妨碍邦交”，英雄的十九路军被匆忙调到福建“剿共”，上海周围竟不准中国军队驻防！蒋介石嘴里喊着“武力收复失地”、“长期抵抗”，到头来却仍是按兵不动，一

味退让，“长期屈服”。蒋介石抱定“反共”的“基本国策”，这次又亲自挂帅，带领五十万兵马，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虽然东北的抗日民众，还在舍生忘死地战斗，蒋政府却依然文恬武嬉，积极准备内战。上海的救亡运动被“取缔”、镇压，已趋低潮。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正忙于整理内部，策划新的冒险。严重的时局为沉闷平静的表象所掩盖，但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我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候，回到了伤痕累累的上海。由于强盗飞机的狂轰滥炸，商务在闸北的印刷厂、东方图书馆等已成废墟，商务印书馆宣告停业，我也丢了饭碗。这时候，我与韬奋联系上了。记得是《莫斯科印象记》出版后不久，毕云程带韬奋来看我。韬奋十分喜欢我那本小书，并且不厌其详地询问苏联社会诸方面的情况。听我讲述自己在法国留学时，怎样利用假期，利用世界语会关系，一面实地考察西欧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一面认真研读《资本论》的情形。他约我为《生活》杂志写稿，彼此畅抒胸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次，他得知我大病初愈，又失了业，便马上跑来看我，而他自己也正在为《生活》面临停刊的事烦恼。原来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是黄炎培的职教社办的，因宣传抗日，抨击“不抵抗主义”，引起蒋介石不满，蒋正在逼迫黄炎培停办《生活》，而邹舍不得失去这块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宣传园地……于是，我出主意叫《生活》脱离职教社，改为《生活周刊》，同时自己动手，筹办一家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韬奋素来从善如流，马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生活》杂志社同人的一致努力下，很快筹办了生活书店，由我起草了社章。从此，我与生活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始终没有公开参加过生活书店的活动，只在暗中擘划协助。我和韬奋相约，为发展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为宣传爱国主义，呼吁抗日救亡，为唤起民众，促使全民族圣战的早日到来，而竭诚努力。

《生活周刊》独立后，除保持原有特色外，还开辟了评述国际形势和中日问题的专栏，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列宁说过：

"我们要使每个女厨子都能了解政治是怎样处理的。"

这是宣传工作者的愿望，也是我和韬奋的理想。我们曾利用手中的一支笔，利用我们创办的报纸杂志，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做过各种努力。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进而掌握自己的权利和命运，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韬奋所说："人民能够了解政治是怎样处理的愈多，政治当然就更容易上轨道……""一国政治的出路往往和国际形势脱不了关系，世界大势的了解和本国政治的了解便息息相关……"针对当时一些帝国主义代言人和失败主义者散布的"日本帝国不可战胜"、"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和"中国人无用"的谬言，我恳切地告诉读者：

"中国民众并不是全没有用的。假如说中国民众永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与其同盟者的内外夹攻，则不该有东北义勇军的奋力斗争；不该有上海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日；更不该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五卅运动与香港大罢工。何况帝国主义的本身崩溃已不可避免，全世界劳苦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已蓬勃而不可遏抑。这四万万余广大群众的大叛变，必有一日到来，推翻了帝国主义世界的现存秩序。不过这必须在中国民众充分明了了自身任务，和环境形势的那个时候。到了民众充分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用民众的武力来和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作坚决的斗争时，那不论帝国主义的力量怎样强大，网罗怎样周密，也是无法抗御的。这不但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也是一条最后的必胜的路！"

为了使"女厨子"都关心政治，关心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个最大的政治，为了使民众充分明了自身的任务和国际环境、国内情势，我利用在哈瓦斯社工作的有利条件，把最新的世界局势、各国动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写成深入浅出的国际问题评论，尽快地介绍给读者，使《生活》这份时事性周刊，紧跟瞬息万变的形势，受到各界欢迎，销行十几万份。后来，为满足广大

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国际问题知识、对世界形势与我国政治的关系等，愈来愈强烈的求知欲，我们又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此外，我们还组织时事讲座、读书会，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这些说起来很轻松，在当时却是要冒被关押、被杀头的危险的。自从九一八事变揭开了近代中国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以来，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妄图以法西斯专制，维持其独裁统治，做希特勒"第二"。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排除异己，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用《危害民国治罪法》，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用绑架、暗杀，对付爱国知名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如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的被捕，左翼作家应修人的被害，丁玲、潘梓年的被绑架……隔不了几天，就有谁被捕，有谁失踪的事件发生，到处"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与此同时，他们进行文化"围剿"，大量查禁抗日书刊，限制言论自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他们的法西斯举动愈来愈疯狂，最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法租界内，公然谋杀了著名的国民党中坚杨杏佛！杨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第一任总统府秘书，是一位颇孚众望的饱学多才之士。一九三二年冬，杨与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任总干事以来，为营救一切在押政治犯，调查宣传，奔走不遗余力。就在他遇刺之前，他还在为营救丁玲、潘梓年等积极奔走呼号。正因为他洞知他们的鬼蜮伎俩，专门揭他们的黑幕，又不惧威胁恫吓，才遭此毒手。我和韬奋经鲁迅先生介绍，于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九人执委之一。记得每周开会，都是由杨总干事用英语宣读调查报告，宋庆龄会长等提抗议，发宣言，由到会的外国记者向世界各国发布，制造国际舆论。杨先生待人的豪爽热诚，他的滔滔雄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杨先生是为争取民权、保障民权而死的，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真正的国民党人。他的死震动了国内外，上海更是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风传有五十六人的"勾命单"，还说要

在杨先生大殓之日动手，我、韬奋和鲁迅先生等也名列其中。大殓那天，许多“单上有名”的人都去了，宋庆龄会长还发表了悲愤激昂的讲话，鲁迅先生连钥匙都不带。我和韬奋没有理睬那些谣言，相约同行，并肩前去万国殡仪馆，向这位因公殉难的爱国志士，献上我们最后的敬意和哀悼。

不久，韬奋出国暂避，游学美国。哈瓦斯的张买办唯恐我也逃去，影响他的业务，特为宽慰我说：“人家说你是共产党，我知道你不是。你只是因得不到政府重用，有些牢骚。你不要害怕，你住的法租界我还管得到，晚上用我的车接你上班，工作完了再送你回家。我的车是很保险的……”

其实我根本走不开，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已转移去瑞金，我在周总理走以前，已被接纳成为中共党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韬奋出国后，生活书店已由我暗中负责，《生活周刊》每星期一篇小评论，也由我代写。但我不到书店去，稿子都由毕云程取送。

做东北军的工作

到了一九三三年底，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我写了篇短评表示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以此为罪名，通令全国，查禁了《生活周刊》。事隔两月，我们又办起了《新生周刊》，由杜重远出面任主编，我和艾寒松负责具体编辑工作。重远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一二八”前后，他到了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由于《生活周刊》募捐支持东北义勇军，杜遂与韬奋相识而成为知交。杜有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又和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是旧友。我出主意叫他出面接办《新生周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除每期文稿要送审检查外，内容尽可以保持《生活》本色。生活书店把《新生》第一期赠给《生活》的原来订户，许多同情《生活》的读

者，甚至以为杜重远就是邹韬奋的化名，都纷纷寄款订阅，《新生》的销数比《生活》的还要高。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新生周刊》发表了易水的《闲话皇帝》，日本政府认为这篇短文"侮辱了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因此吓慌了手脚。他们派要员与重远软磨，要他承认此文未送审，文责自负，与当局无关。法院即可按违犯报刊审查法定罪，处以罚款，罚金由他们出，不过要搞一次假审判搪塞日本人。第一次开审以后，日方得知将以罚款了事，马上又提出抗议。法院迫于压力，在第二审时，竟改判重远十四个月徒刑！假审判变成了真冤狱，重远被送入漕河泾模范监狱，《新生周刊》被封闭，这就是当时中外震惊的"新生事件"。

以支援马占山抗日而闻名的杜重远，遭诬陷入狱，这消息对于崇敬重远的东北军官兵，无异于晴天霹雳。东北军兄弟纷纷借开会、公差之便，或假托名义到上海漕河泾来，慰问他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重远代当局"受过"，《闲话皇帝》的送审证明还在他手里攥着，国民党自觉理亏，而主管监狱的又是蔡劲军，杜理所当然会受到特殊优待。他们在监狱后面的荒地上，特为重远新盖了三间平房，重远自己请了厨师做饭，并且设有传达室，来访者必须先用电话通报姓名，得到同意方准入内，这样就避开了特务之流的监视干扰。重远的监房成了宣传抗日救亡，商讨机密大事最安全的地方。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总是一清早就去漕河泾，直到晚上才回家。重远除了自己对东北军兄弟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外，还把他掌握的东北军现状，以及上下官兵的思想动态告诉我，叫我"对症下药"，给他们做点扎扎实实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远总是事先约好一些东北军的人来，我们在一起交谈。我向他们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让他们认清形势，辨明方向。我们向他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险恶，以及已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宣传共产党反蒋抗日的主张，鼓励东北军

站到反蒋抗日的一边来。谈一次不行，就谈两次、三次，在狱中谈，还和他们到外面谈。通过耐心说服，我们争取了来访的一些东北军知名人物，如曾经当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经重远介绍我们在狱中认识交谈以后，我们又在外面饭馆里会面谈话，先后作了三次长谈。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告诉他，现在实行三民主义是行不通的，国亡无日，何来民主、民权、民生？只有赶走了日本侵略强盗，中国才有希望……高崇民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后来张学良把高派到杨虎城那里住下，他很好地完成了说服杨虎城的工作，为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的联合抗日，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给东北军做工作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与东北军官兵身受国破家亡之苦，又背着"不抵抗主义"的羞耻，要求抗日复土、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分不开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托故来上海，秘密会晤了杜重远。他俩是同乡，又是老友，可以无话不谈。他这次来是为倾吐心中郁积的苦闷，向他所佩服的重远讨主意的。他坦率地诉说了他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一心不贰追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政策，由东北退到关内，由华北退到华中，由华中转移西北，奔突转徙，离老家越来越远，力量削弱，士气低落。现在当了西北"剿共"司令，与红军刚刚交了两次锋，就损失了近三个师！蒋介石对东北军的生死存亡无动于衷，马上取消番号，停止供饷。照此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光杆司令"。自身不保，还侈谈什么"安内"、"统一"、抗日？将来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杜重远老实不客气地批评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又庆幸他迷途知返，"大彻大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借内战之机，消灭异己，实行法西斯独裁的野心。为今之计，除了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走联合抗日的道路，别无他途。重远又入情入理地分析东北军所处的有利条件：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组织国防政府，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中央红军现在陕北，可以就近联合，共同抗日；杨虎城有抗日救国之心，西北军与东北军比邻而居，更易合作；新疆盛世才是东北老乡，据有有利的地理条件，与苏联关系很好，不难晓以大义，予以联合。有此三条，可以形成“西北大联合”，走联合抗日的坦荡大道……张学良对于杜重远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东北军的前途、他个人的前途出发，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但他顾虑共产党是否愿意和他这个“剿共”司令、曾经刀枪相见的“敌酋”联合。后来，张学良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李杜等，并希望李杜帮助他沟通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李杜欣然答应相机行事。

重远把上述一切告诉给我，希望我能帮助摸摸情况，疏通关系。我听到后非常高兴，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已下，要是“西北大联合”能够实现，势必改变整个国内局势。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将指日可待。我急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报告这一新的情况。但是，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组织几乎破坏殆尽。此时，党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上海党与党中央已失去联系。前不久，田汉和阳翰笙等在开会时被捕，前去开会的宣侠父，得保姆的告警才幸免于难。宣侠父是我的直接联系人和领导人，他在上海已无法呆下去，只好跑到香港避风头去了。临行时他嘱咐我，在遇到危险时，可以去香港找他。接着，为我联系生活书店的毕云程也被捕了。他从审讯中得知，他们要抓的不是他，而是我。他们说：“我们要抓的是一个矮个子，等抓到了再请你来对证。”毕云程被保释出来后，立刻跑去找邹韬奋，告诉这一情况，要韬奋劝我赶快离开。但是，我那时正忙于和杜重远一起做东北军的工作，没有马上走。当时，接替宣侠父与我联系的严希纯也被捕了，为安全起见，我决定尽快离开上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